

“不降价联盟”的开发商不懂市场之变

■今日视点

沈阳房产协会组织72家房地产公司搞了一个“不降价联盟”，联合起来对消费者说：一年之内不降价。央视《今日观察》在专题节目中讨论这个现象时说：“不降价联盟”涉嫌操纵市场价格，注定要土崩瓦解。

似乎是要印证央视专题节目的观点，央行十七日发布的《二〇〇八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》显示：中国居民购房意愿已经降至历史新低。

(11月17日《中新社》)即便没有央行的这个报告，相信沈阳的开发商们也都知道现在房子难卖，按照正常的逻辑，他们应该顺势而为，在政府出台各种措施鼓励居民购房的基础上降价自救才是，但他们却偏偏搞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“不

降价联盟”，这只能说明，这些开发商和当地的房产协会，并未真正认清形势、懂得市场。

我所说的形势，一方面是光靠政府鼓励购房无法消弭市场浓厚的观望气氛，另外一方面，则是指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将逐渐走出开发商垄断的局面，开发商们说一不二的定价权将一去不返。

购房意愿创新低已经是事实，光靠政府减免税费无法令楼市回暖，这是并不复杂的道理，我相信那些结盟的开发商也是很清楚的，他们之所以逆市而为结成“不降价联盟”，在于没有认清中国房地产市场即将到来的格局之变，以至于仍然把自己当成了强势的定价者。

在四万亿刺激经济的“国十条”中，扩大保障性住房的供给是重中之重，随后，各地也分别明确了保障性住

房的建设和上市规划。这其实已经传递了一个很清楚的信号：保障性住房将是商品房的有效替代者，随着供应量的增加和覆盖面的扩大，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商品房潜在客户成为保障性住房的受益者。也就是说，房地产市场将很快出现两个市场，一个是商品房市场，另一个是保障性住房。让两者之间实现良性竞争，这也是很多国家完善住房市场的成功经验。之前开发商们之所以有如此强势的定价权，是因为保障性住房的严重短缺，造成了商品房事实上的垄断地位。但现在，保障性住房与商品房展开竞争已经是一个看得见的变化，开发商们还要以垄断者而非竞争者的姿态出现，搞所谓的“不降价联盟”，我只能说，这真的很不明智，很容易就会把自己逼进一条死胡同。

很多人一直在说，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竞争程度最高的市场之一，中国的开发商们也是市场意识最强的群体之一。表面上看来是这样的，满天飞的房产广告和一个比一个气势大的宣传语，给了我们“房地产市场高度市场化”的错觉。但骨子里呢，其实中国的开发商们并没有强烈的市场意识，因为商品房整体上是缺乏竞争的，只要盖房子就能赚大钱，在这样的垄断利益中，开发商们又怎能真正市场化起来。现在的形势，开发商的日子不好过，但这是开发商们真正成为市场竞争者必须经历的阵痛期，要安然度过这个阵痛期，搞什么“不降价联盟”死守暴利当然不是办法，跟万科一样尽早学会以竞争者的低姿态参与市场，赶紧降价自救回笼资金，才是正道。(本报评论员 赵勇)

开征燃油税的确不能再等了

■热点纵论

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韩文科11月18日向英文版《中国日报》透露，中国政府将马上开始征收燃油税。韩所在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表示，征收燃油税的时机早已成熟，可以马上实施。

的确，中国征收燃油税的时机已经成熟——经过几个月的下跌，国际油价已经进入比较正常的区间，国内国际油价的价差也基本上消除了。如果燃油税要“择机”开征，那么现在就

是最好的时机。

按照国际上的普遍观点，开征燃油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契机就是低油价。因为低油价能够减少一些行业比如出租车行业、公交行业、农产品行业等因开征燃油税而带来的阵痛。之前，国际原油价格一直高高在上，而国内成品油价格也在接连蹿涨，这也是国家主管部门迟迟不愿开征燃油税的关键原因和顾虑。而现在，国际油价维持低位，这显然是一个难得的契机。

既然开征燃油税是必

须的，那么它就是宜早不宜迟的事情。为了把油价维持在每桶70至90美元的水平上，欧佩克10月24日在维也纳举行的特别会议上决定，从11月1日起日削减石油产量150万桶。欧佩克轮值主席、阿尔及利亚能矿部长说，欧佩克有可能进一步削减石油产量。这意味着不久的将来，国际油价可能会在当前这个油价的基础上出现普遍上浮，而油价一旦上浮，我国开征燃油税的最好时机就没了。因此说，开征燃油税不能再犹豫了。

当然，开征燃油税因涉及到多个主管部门的切身利益，尤其是交通运输部和财政部。比如，燃油税开征了，这两个部门将会因燃油税的问题进行新一轮的利益划分。在燃油税出台之前，巨额的公路养路费是由交通运输部收管，但开征燃油税之后，养路费没有了，则意味着过去的“诱人蛋糕”将由交通运输部转移到财政部手中。就此，交通运输部应以大局为重，为燃油税的出台主动扫清道路。

(陈震)

“怪胎油价”源于消费者的弱势

■相关评论

纽交所原油结算价已经跌至54.67美元/桶。各国油价跟随国际形势，迅速作出调整，而中国油价面对民众日渐高企的呼声却“固执”地按兵不动。从过去经常在某天突然提价，到如今顾左右而言它，中国高油价正成为世界怪胎。

(11月18日《新华社》)怪胎油价，印证了一个痛苦的现实，在垄断经

营者面前，消费者人数再多也是弱势群体。油价扭曲的背后是权利的扭曲，欲正价格必须正视消费者权利上的弱势，只有这样才能让发展符合于大多数人的利益。

从油价的变动看，真正权利无保障的是那些人数众多的消费者，而那些经营企业，却是很容易地给决策层施加压力。可我们发现，政府部门却有着误判弱势群体的嫌疑：他们不断地

给石油经营者以政策倾斜，如政府补贴、提价等等。这般的偏爱，使得本已权利匮乏的消费者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。

油价反映了一种真实的生态，也就是人们对于权力与资本的结合缺乏有力的制约，这样的扭曲社会生态，也不会产生规范的市场，我们发现凡是垄断资本存在之处，就是公众权利无保障之处，而那些国家早已放开的领域，也就是公民权

利均衡配置的领域。改革需进一步深化，权力必须更多地呵护弱势者的权益，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市场的稳定和谐。

我们希望有一个更均衡的油价议价体制，使得经营者与消费者的权利均能很好地维护，只有这样，他们才是法治中国的强势公民与市场主体，而不是权力与资本结合下潜规则的适应者。

(邹云翔)

“监管是最大爱护”是迟来的领悟

【媒体思想之曹林专栏】

食品安全事故层出不穷，也让国家质检总局新任局长王勇成了“最忙的部长”。这位忙碌的部长近日强调：质检部门加强监管是对企业最大的爱护和服务。

(11月18日《中国政府网》)加强监管是对企业最大的爱护和服务——发生了这么多食品安全事故，丑闻击垮了这么多企业之后，质检部门终于意识到了这个基本常识，这真是一个代价沉重、迟到的领悟。

专家每每分析到“国货为何总难崛起”这个议题时，经常提到的一点就是“政府对民族品牌缺乏保护”，其实恰恰相反，正是不适当的保护和溺爱导致监管缺位，使一个个国产品牌死在了低水平监管、自由放任的温柔乡中。这在三鹿的垮塌中表现得淋漓尽致，平时看起来很强大的一个企业，说垮就垮了。某个丑

闻曝光后，动不动就是整个行业的信任危机，动不动就是国产品牌全军覆没，低水平的监管难卸其责。

今天意识到“监管是最大爱护”了，可在以前流行的监管理念则是“纵容是最大的爱护”。

比较常见的是，有的地方害怕严厉的监管会吓跑投资者，于是以“放松监管”的条件去招商引资，以承诺“零监管”吸引商人来本地办企业；有的地方把“放松监管”当做壮大企业、提高竞争力的良方，赋予企业种种免检特权，对企业的违法行为睁只眼闭只眼；有的地方监管被资本利益所俘获，监管者迎合企业逃避规制的不良期待。

政府放松监管，表面上看似乎保护了企业，使企业获得了自由空间和暴利机会，其实是害了企业。由于缺乏监督，企业缺乏规则压力和创新能力，逐利的欲望得不到约束，

恶欲滋长贪婪膨胀，优胜劣汰的野蛮丛林中，企业不仅无法壮大和缺乏竞争力，而且总有一天会为无节制的逐利支付昂贵的代价。

三鹿就是明证，许多慢慢消亡或突然死亡的国产品牌也是明证，他们都是死在监管缺位的温柔陷阱中，如果监管能严厉一些，企业起码死得不那么快和那么难看。

其实，“监管是最大的爱护”不仅适用于食品监管，更普遍适用于对公权力的监管上。许多官员接受媒体采访时都曾感慨如今的当官风险越来越大，今天这个落马，明天那个落马——为什么风险会这么大呢，因为当官面对的诱惑太多太大，时时处处面对着以权谋私、以权换钱、权力寻租的巨大诱惑。

而这种诱惑很多时候又缺乏法治约束和制度监管，使官员很容易就走上贪腐的道路不能自拔。从这个角度看，纯粹让官员在道德

上抵制那么巨大的诱惑实在很不人道，强化制度监管真是对官员最大的保护，保护其能够抵制诱惑减少贪腐的风险。

记得李金华在卸任前曾再三请求安排其他部门“审计审计署”，他对于“审计署审计别人，谁来审计审计署”的问题一直充满着焦虑。这种表态当时赢得了舆论的一致喝彩。

李金华为何一再吁求别人监督自己呢？主要也是明白“监管是最大爱护”从而寻求一种保护。他深深地明白：审计其他部门、揭露其他部门违规的审计署拥有巨大的权力，这种权力很容易被滥用，这种权力使审计工作者时时处于被收买的诱惑之中，只有强化外部监督才能保护这种权力不被滥用，保护审计工作人员不坠入腐败深渊，不死于无人监管的温柔陷阱中。

(作者系《中国青年报》编辑)

“寻官启事”讽刺的是官太多

【中国观察之椿桦专栏】

“寻官启事”虽是新生事物，但有一种流行的趋势。继海南文昌市街头首现“寻官启事”后不久，湖北大冶市也有人效仿，取得了不错的效果。《长江商报》11月18日的报道说，大冶市一些路段“黑的”泛滥，多年来无人管。于是有署名“文明治人”的好事者四处张贴“寻官启事”，希望找个官员来管管，果然获得了有关部门正面回应。

比照上个月文昌“电线杆被撞坏10天无人管”，湖北大冶“黑车泛滥多年无人管”的情节显然更过分。大家当然也会与新闻当事人一样，有此一问：当地官员们都到哪去了？人们大概会分析认为，在酒店里，在风景区，在出国考察的飞机上，都不难找到官员的身影。想在大街小巷看到他们，九成是要失望的。

这样来看，“寻官启事”中所谓的“无人管”，并非我们的官员真的太少太忙。恰恰相反，问题就在于我们的官员太多了。因为官多，所以官员们都觉得事情不该自己管，每个官员都有理由让自己清闲一些。去景区，去考察，去应酬，去开会，都好过坐在办公室——让自己在别的事情上忙起来，是避开“可管可不管”事项的最佳选择。

因为官多，才导致职能交叉现象比较严重。拿黑车破坏城市环境与市场秩序来讲，可负起责任的部门包括：交管部门、城管部门、市政部门等。但正由于职责的“模棱多可”，相关部门

也可以在面临问责时相互推诿。前年夏天发生在陕西渭南市的红绿灯停电事件，就是很好的例子。当时，该市主要街道的红绿灯连续几天“罢工”，电子警察成了“睁眼瞎”，交通一片混乱。原因就在于，供电部门认为交警部门长期拖欠电费，交警则认为电费应当由城建部门缴纳，城建部门予以否认。直到该市召开联席会议，才算解决问题。

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你就会明白我国为什么经常出现“多部门联合执法”“多部门联合行动”之类的特色词眼了。是因为这“多部门”都对相关问题承担着部分管理责任，但又不完全负责。也正因为职责归属不明确，我们才有了“十个大盖帽，管不好一顶草帽”的俗语。

我们有这么多的官，然而普通百姓想见他们一面，却非易事。有些问题无人管，固然是职责归属不清所致，但有时也是因为官员受视野所限，压根没见着。于是，每当媒体披露了，官方才手忙脚乱地进行处理。事实上，公共事务中“无人管”的问题还有不少，只是大部分都没有披露出来罢了。

海南文昌“无人管”事件发生后，有论者提出应对不作为官员问责。想想看，上级真要愿意采纳此建议，又如何着手呢？可见，职责归属明确才是问责的前提。而要想真正提高公共事务的管理效率，不是官员越多越好，而是越少越好——越少，责任越明确，出了事才避无可避。

(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，有时事评论集《舆论尖刀》问世)

缓调最低工资应有补偿措施

■热点纵论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17日发出通知说，根据当前经济形势和企业实际，近期暂缓调整企业最低工资标准。

(11月18日《现代快报》)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，如果不断调高最低工资标准，只会让“过冬”的企业雪上加霜。而当企业不得不裁员时，大量失业工人又会成为新问题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政府作出近期暂缓调整企业最低工资标准的决定，自有其苦衷，大家应该多理解一点。但人们对缓调最低工资标准的焦虑心情，也应该得到尊重和回应。毕竟，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，民众也是“过冬”者，受损失的不止是企业。

目前政府直接救企业的措施明显大于直接救民众。比如，国家提高了相关产业的商品出

口退税率，同时宣布了明年针对企业的减税计划，以及推进增值税转型改革等。而对于民众，并没有直接的救助措施。

民众和企业都是金融危机的受害者，两者都应该得到国家的救助。对于民众来说，最直接的措施是通过提高个税起征点进行全民减税，以及给民众直接发红包或者购物券——这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有过先例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不利，可以暂缓；政府给全民发红包，尽管实施起来有些麻烦，但也不是不可能；而全民减税却不能再拖，前几天茅于軾说起征点8000元为宜，就非常好。总之，政府在出台措施救助企业时，也要考虑到民众的“过冬”需求；特别不能在民众利益与企业利益冲突中偏向后者，万不得已需要偏向时，也应该考虑对另一方进行补偿。

(王攀)

周老虎让我们对真相不再热情

■他山之石

“华南虎照”案二审，周正龙认罪判缓刑。如果把华南虎事件比作一场战斗，那么我们失败了，包括那些一直关注周正龙案的网民，他们曾经热血沸腾地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胜利，但最终等待他们的仍然是习惯性的失败。

华南虎照事件闹了400天终于收场了，陕西方面“守土”功效明显，事件化小曰周正龙案，其余一千人等全部免于起诉。可怜了周正龙及其家人，为了不坐牢就要背负起所有“罪恶”，更可恨了打虎派还有诸多网友，坚持一年，真相大白，却依旧没有正义。而在陕西方面，众目睽睽之下，事件牵涉各方却几乎全身而退，这就是“打

虎”一年的成果？

华南虎照案最后成了周正龙案，这样的表述，大概一开始就注定了只审判周正龙，不审判背后黑手。于是，诸如周正龙不会PS技术这样的常识，司法机关就可以视而不见；于是，一个疑点多到让人难以置信的事件，最终的结局就在意料之中。现在，皮剥下了，但“无皮的老虎”依旧裸奔。再坚强的英雄也是人，大家终于累了、厌了、烦了、失望了，甚至是绝望了。网民们其实已经不再关心周正龙的二审，因为结果早已注定，他们的热情也已耗尽。面对这样的结局，陕西各方或许在偷笑，但当人们对真相不再有热情，那又是多可怕的事。

(作者：银玉芝 原载于网易评论，本报有删节)